

风雨奋进四十年

北京日报社经验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北 京 出 版 社

风雨奋进四十年

北京日报社经验选

(1952—1992)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北 京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风雨奋进四十年
北京日报社经验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9.25 印张 188000 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0-01838-1/G·552

定价:(平装)8.80 元 (精装)11.80 元

目 录

怀念与敬意	范 瑾 (1)
坚持唯物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	周 游 (13)
要做时代的号角	张大中 徐惟诚 (23)
从实际出发, 为人民服务	徐惟诚 (31)
报社的出路也在改革	王立行 (38)
愿我们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起来	许 文 (55)
发挥报纸优势 开辟“第二战场”	李志坚 (61)
党的基本路线是办报之魂	满运来 (72)
坚持新闻“改革不改性”	刘虎山 (85)
组织好战役性的宣传报道	匡于中 (96)
爱好与追求	曹世钦 (102)
和采访对象亲密合作	顾 行 (106)
畅想今后	杨正彦 (112)
第一仗	卢念高 (117)
采访和调查	王政人 (123)
坚持评论的科学性	邵毓奎 康宏志 (131)
风波之后的回顾	鲍 言 (137)
组织思想讨论的一点体会	周一兴 翁开望 (146)
理论宣传要为读者答疑解惑	黄华昌 (154)
理论联系实际的探索	吕立勤 (158)
有心创特色	陆元炽 (164)
1956 年到 1958 年日报的体育专栏	何礼荪 (179)

亚运报道与热点舆论	刘宗明	(188)
新闻纸要求新	许承康	(199)
日报迎亚运报道是怎样组织进行的	肖 贞	(209)
办好大众新闻文化副刊	宗春启	(215)
我编大众科学	陈凤兮	(221)
运用史料为现实服务	王 迪 董志新	(224)
没看见不写	蔡赴朝	(229)
✓人物新闻写作的创新	刘连枢	(234)
努力展现“科星”的风采	科教部	(244)
新的尝试	张雅宾	(251)
一个专栏：新闻改革的尝试	严力强	(260)
采写《南韩继》有感	郭福长	(268)
青山巍巍何处寻	李乐兰	(274)
《听课记》采写前后	姚世光	(282)
现场采访与写作	满运来 焦保强	(289)
✧让“思想储蓄”更丰富些	李守仲 范三成	(297)
✧抓好反映时代精神的典型	董耀昌	(302)
先进人物和时代精神	张廷军	(306)
一次关于反面典型的采访	诸有琼	(315)
用情配小诗	李传琇	(322)
齐心协力 共创一流	李士炘 王振民	(331)
✓不拘一格谋版式	总编室	(341)
评论员·厨师·守门员	许炳炎	(350)
✓眼睛能向下 天地自宽阔	肖衍庆	(360)
记者与群众工作	宁源涛	(368)
我干信访十二年	谭德初	(372)

我们怎样办好《北京日报》内参的	耳宝君 (379)
放开手脚搞经营 发挥优势办大事	杨洪运 (387)
紧紧围绕编委会的中心工作 发挥办公室的参谋助手作用	刘广和 徐文珍 (396)
告别铅与火 实现印刷工艺革命	庄兴昌 (404)
扩大对外交往 为首都各项事业服务 ...	刘广和 张伟雄 (412)
时刻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柴向武 (420)
广告经营管理的回顾与展望	王增一 封晓川 (426)
两次飞跃	李润田 (432)
知我中华 爱我中华 振兴中华	孙永仁 (436)
让北京走向世界 让世界认识北京	王兆平 (442)
发挥优势, 开拓新领域	刘 艺 (451)
难忘的记忆	郑 千 (459)
√ 无事也登三宝殿	汤小薇 (462)
√ 记者应是个勤快人	王增民 (468)
√ 做生活的有心人	程玉扬 (473)
创办晚报的探索 纪 刚 方 亭 顾 行 王 敬 王 迪执笔	(480)
晚报复刊后对提高可读性的探索	叶祖兴 (489)
扩大信息量 增强思想性可读性	李丙仁 (498)
解决好几个关系	张志华 (504)
议论风生办副刊	刘孟洪 (509)
从社会中来 到社会中去	郭仲义 (522)
传播精神文明的花与刺	王复羊 李时民 (529)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社会赞助活动的回顾及认识	苏文洋 (535)
为了小读者	宫异娟 (542)

报纸科学副刊要突出新闻性	黄天祥 (551)
让“一分钟小说”之花常开不谢	魏 铮 (559)
泼辣·幽默·人情味	宋 汐 (567)
培养农民的读报兴趣	孙秉友 (574)
架桥	唐应生 (581)
为农民子弟效劳	王保春 (590)
跟追新情况 传播新知识	李沛畴 (597)
提供信息 牵线搭桥	彭淑云 (604)
要敢于写批评报道	杨先慧 (609)
旗帜鲜明 答疑解惑	王敏璠 (614)
增强读者意识, 努力办好《新闻与写作》	张伊青 (621)
新闻家族的新秀	吴亚芳 (626)
业精于“勤”	车崇仁 (631)
充分利用高科技, 做好报纸排版工作	孙树庚 (634)

怀念与敬意

忆市委领导同志对《北京日报》的领导与关怀

范瑾

回忆十年动乱前我在《北京日报》工作的日子，我就想起了党中央、市委领导同志对《北京日报》的细致关怀，心中充满着对他们的怀念与敬意。《北京日报》的报头是毛主席写的。毛主席、周总理还对《北京日报》上登的新闻报道、漫画、小品文、短评等提出过意见，有表扬有批评。刘少奇同志亲自来报社谈思想讨论的结论。这都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

本文主要回忆市委领导同志对《北京日报》的领导与关怀。

**彭真同志、刘仁同志及市委领导是直接
参加新闻实践的，是报纸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报纸编辑部是负责采访通讯、编辑、出版工作的。市委是报社的领导，使我难忘的是，市委领导同志从彭真同志、刘仁同志起，都是把领导报纸工作当成自己的职责，直接参加新闻实践，尽管工作十分繁忙，还要挤出时间来给报纸出主意，组织稿件，改稿、写稿，直到帮助报纸编辑部解决具体问题。

《北京日报》创刊词是廖沫沙同志起草，经过彭真同志修改后

定稿的。廖沫沙同志是当时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创刊之初，他每天夜里在编辑部要看完大样才回去。他不顾瘦弱带病的身体，靠在沙发上看大样，和我们尖锐地谈到编辑部内部工作。他的强烈的原则性与责任心，坦率的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们难忘。

在创刊之初，报纸来稿少，文章长，与《人民日报》重复多，地方性差，脱离群众。我们在1952年10月15日把情况报告给彭真同志，彭真同志很重视，在10月16日晚上召开了区县局及直属单位负责同志会议。彭真同志说：“《北京日报》已经发行半个月了。这一时期，《北京日报》的主要缺点是内容空虚、消息零碎、缺乏中心。内容为什么空虚呢？因为我们这些‘老爷’（市、区及部门负责人）没有负起责任。办报不能像看戏一样，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光挑毛病，而必须‘老爷负责，全党办报’。”会上说了办报的重要意义，要求市、区及各部门每月提出报道计划、列出题目，送到报社编辑部。又向报社提出“要登短文章，不要又臭又长的文章，文变短了，不好编排，可以搞单元。每一个单元有群众意见、有批评、有表扬、有过程，有中心，也就生动活泼了。”“如何编法？主要是提出中心，组织稿件。”他要求每一项报道都要有特点，他说，“不要老是‘共同纲领’式的文章和标题，老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的‘八股调’。要有创造，永世不创造就永世没有生命。”在这次会议以后，各单位重视发展报纸的通讯组织，不少单位按月送报道重点、选题计划，报纸编辑部加强了通讯工作、群众工作，来稿日见增多，报纸内容空虚的局面逐步改变了。文章要通俗，要短，注意单元报道，也逐渐成为《北京日报》的一个重要传统。

彭真同志对我们说，《北京日报》是地方性报纸，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有地方性，不能有地方主义，第一版上要经常有本市报道，但全国性的重大消息、文告不能遗漏。他多次给

我们来电话，叫我们把漏登的消息、文告补登。同时，他又对我们说，作为地方报纸，在宣传上，也要注意不要压倒中央，中央有些指示没有公开发表，我们如果大肆宣传北京市如何贯彻的，报纸上就会出现光见市不见中央的情况，这是不妥的。

彭真同志提出虚心听取意见的重要性。他说，有些同志不大听别人的意见，这不好，要多听意见。不能光凭自己的兴趣，首都不只是市委书记处和市委常委的，北京市不能讲本位主义，不能闷着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首都都是大家的，人人关心首都都是很好的。首都要了解全国的东西，有责任听全国的意见。

彭真同志带头运用报纸解决问题。创刊不久，本市发生了部分建筑工人闹事事件，有一个建筑工程队的建筑工人，因工资问题罢工，这对其他工地也产生了影响。这事在我们看来是不可以报道的。彭真同志对我们说，要运用报纸做工作。他带我们到工地调查，开座谈会，查明闹工资问题是因为有几个干部（和他们的上级）处理工资问题不当。他就叫报上登报道批评那几个干部的错误，提高工人的觉悟；亲自教我们写报道和社论，并仔细修改。社论的初稿，彭真同志觉得写得不好，亲自动手改写了。彭真同志说，要把这期报纸作为基建工地职工的学习材料。这一组报道于1953年1月26日《北京日报》一版刊出。这期报纸发出去以后影响很大，同时具体工作也做得及时，这个队建筑工人的罢工很快地解决了。从那时起，《北京日报》得到了基建战线上干部、工人的欢迎，各工地订的报纸较多，报纸在基建战线上的局面打开了。

彭真同志和刘仁同志十分关怀和爱护《北京日报》。他们认识报社的许多记者，和同志们亲切交谈。刘仁同志解决了办报的许多具体问题，最重要的是给报社培养和调配干部队伍。彭真同志重视报社的干部队伍，尤其重视从事新闻工作的干部密切联系实

际。他说，编辑部的干部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在下面做实际工作，一部分做调查研究，一部分在编辑部工作，互相轮换。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贯彻这一精神。从50年代到“文革”前，《北京日报》的编辑、记者到基层蹲点，搞调查研究，固定联系基层单位，参加劳动，基本上形成制度。有的记者还到基层参加较长时间的劳动和代职。刘仁同志、市委常委支持编辑部从各区、基层单位调来干部，并从优秀通讯员中选拔干部。那时大学毕业生来源很少，刘仁同志叫我们从高中生中选择培养新闻干部，自己办训练班，当时的青年同志，不少人现在已成为办报的骨干力量。又如房子问题是北京市最难办的问题。刘仁同志亲自解决报社的基本建设问题。盖房子没有地皮怎么办？刘仁同志就带周游同志和我去看了几个地方，最后选定了现在北京日报社的地点。这里本来是准备盖市委宿舍的，刘仁同志认为这里比较合适，就告诉市委办公厅把这块地皮给我们了。报社的绿化基地，本来是市委的地方，刘仁同志觉得给我们用比较合适，就告诉市委办公厅也把这地方给我们了。三年困难时期，报社用纸发生了困难，刘仁同志帮助解决用纸问题，还准备筹建自造纸厂（后未建）。他关心报社职工的健康状况，仔细向我们问肝炎病人有多少、情况怎样。刘仁同志同我们谈起报社的建设，津津有味，关怀备至。

郑天翔同志是常务书记，又分管北京日报经常工作，他是一个很忙的人，但总是安排时间按月和我们谈本市的形势，分析经济情况，提出具体的宣传要求。每逢市委集体讨论《北京日报》的工作，他总要提出比较全面的、切中要害的意见。他看稿细致认真负责，详细修改。他出了不少典型报道题目。郑天翔同志强调报纸要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不要说空话、大话，他最不喜欢用夸张的形容词，有时叫我把这种形容词从稿子中去掉。

邓拓同志是主管文教的书记，他是新闻界老前辈，经常和我

们谈新闻业务。虽然他身体不好，勉强支持工作，仍为日报、晚报撰稿，甚至在到海南岛视察途中，仍继续按期写《燕山夜话》。他嘱咐我们要支持作者和编辑记者的创造。他喜欢《文汇报》，多次提到要我们向《文汇报》学习。他强调一张报纸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来。他说《北京日报》要做到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强调联系和培养作者、积极分子和通讯员，说要和通讯员、作者交朋友。他多次提出改进理论宣传、学术宣传的具体做法和选题，要求理论宣传、学术宣传通俗化，理论要深，表现要通俗，深入浅出。他还说通俗化不等于简单化，通俗化和简单化是两个概念，二者之间没有联系，没有推理过程。他还叮嘱我们对写文章的人要具体帮助加工，好好改稿子。

陈克寒同志是主管财贸的书记。他也是新闻界老前辈，对《北京日报》很关心，提出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经常在假日不休息给《北京日报》写稿，并对《北京日报》登的有关财贸工作的典型亲自看过，参加总结。

市委宣传部经常指导报纸工作，与报纸关系密切。宣传部长李琪、杨述同志常为报纸撰稿，制订有关的宣传计划，组织文章。

市委把《北京日报》看作是市委的一个重要部门，彭真、刘仁等同志时常直接告诉我们宣传的精神、要不要宣传、怎样宣传。逢到有重大的中心报道，他们每天提出要求，每天检查报纸版面，指出宣传好的地方和缺点、错误。因此，我们在工作中觉得“心中有数”，敢于宣传。我们要求报纸编辑部与市委感情一致，同呼吸，坚决执行党的指示。

强调宣传的政策性、思想性，重视宣传典型

《北京日报》创刊词中说，《北京日报》“将系统地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报道北京市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市

政建设，特别是生产建设进行的情况，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收集与传播生产建设和各种工作的先进经验，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表扬成绩和优点，批评错误和缺点，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标准，清除反动思想，改造落后思想，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水平，以保证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从创刊词可以看出，办报一开始，市委领导就是重视思想教育，重视宣传典型先进经验的。市委负责同志对我们讲情况、讲政策。1958年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叫我们辨明风向，辨明好的风（青萍之风）和从阴沟里出来的坏风。每个时期针对当时的形势给我们指出宣传重点。1958年叫我们实事求是，提出了经济工作中必须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当时许多地方单纯拼体力，市委领导就叫我们宣传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连续发了十几篇社论及有关报道。1960到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市委领导提出报上应当鼓干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叫我们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栏题，刊登思想境界高、穷干苦干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人物。到1964年，全国形势好转，工农业普遍出现了新气象，工作总是健康的，但也有不实求是的形式主义的东西露头，如学大庆中追求形式，会开得很多，随便加班加点，不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等。这时市委领导同志指出要头脑清醒，爱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宣传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要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宣传要留有余地，适当讲缺点错误，在漆黑一团时要注意宣传光明的一面，形势好时要藏一手；还提出一切准备公开介绍的先进经验，都必须经过深入的调查，反复核实，坚决制止一切可能助长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的宣传报道。

为了对群众多做思想工作，1958年经杨述同志建议，《北京日报》学习《中国青年报》，开辟了“思想讨论”专栏，针对当时群

众中主要的思想问题，展开讨论，引导读者从讨论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这个栏目是很受群众欢迎的，来稿很多，各方面的意见都有。1958年，针对有些群众对党员个人志愿的不同看法，讨论了“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编辑部的姜干里、左麟书、张顺芝请刘少奇同志为这一讨论作结论。少奇同志应邀来到编辑部，做了精辟的讲话。同志们喜出望外，十分振奋。编辑部按照少奇同志的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以后，受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读者的欢迎。1963年讨论“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这个讨论对群众的不同思想作了深入的剖析，群众来稿很踊跃，思想活泼，后来作了系统的结论。这个讨论，受到了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负责同志的鼓励。

彭真同志多次说要重视典型，要市委领导上总结典型经验。1961年市委领导同志对我们说对典型要“二分法”，一分为二，典型不是十全十美的，哪一点好就报道那一点，不要掉到形而上学的泥坑里去。事物是充满着矛盾的，矛盾有解决的，有没有解决的。对先进人物不要一写就把他吹得比马克思还厉害。彭真同志说，对先进人物不应求全，应就事看，通过事谈论人的成就。论事是有意义、有创造性的事，求全就没有可表扬的人了。他叫我们要用手、眼、耳、脑子，不要道听途说。还提出报上登的典型，市委要亲自摸过。彭真同志、刘仁同志亲自总结典型经验。1958年反浪费八大典型是彭真、刘仁同志和市委常委定的；天桥百货商场的经验，1958年是彭真同志总结的，1965年是陈克寒同志帮助总结的，给我们做了示范。那时登的主要典型，如农业方面的南韩继、一渡河、陈各庄，工业方面的石钢白云石车间、拉锁厂等是刘仁同志都去看过的。刘仁同志要求所有在报上登的典型，报社负责人事先必须亲自看过，判定确实可靠。我们在1961年以后才这样做了。编辑部主要负责人轮流去了解 and 采写典型报道。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也是受到市委领导重视的。早在报纸创刊之初，彭真同志就说：“今后主要的斗争形式是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报纸要向一切落后的、保守的、野蛮的现象展开斗争。这样报纸就有生气了。”1953年3月22日市委领导集体讨论报纸工作。郑天翔同志指出，这一个时期报纸给人的印象平淡，不突出，就是因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不明确，不能使人感到面目一新。对于报纸如何开展批评，彭真同志也谈得很多。彭真同志多次说，报纸的批评要是建设性的。我们要的是鼓舞斗志的批评，不是瓦解士气的批评。他还说批评与表扬要结合。批评不要模棱两可。批评时要说明落后怎么落后的，先进怎么先进的。他说可以在报纸上表扬三个单位，批评一个单位，否则是非不清，赏罚不明，就搞不好。批评了这个工厂，有改进就可以表扬。报纸要循循善诱，使人感到批评是日常的事。市委要求报纸进行批评要正确。1953年，张友渔同志在市委讨论报纸工作时说：“批评要有力，又要批评，又要正确，不允许不批评。这事又难又要做。态度要严肃慎重，不要感情用事。”事实上，当时报纸进行的批评有过差错，甚至是很严重的差错。遇到这种情况，市委领导就帮助我们分析原因，要求以后坚决改正。我们常采取一个单元中有表扬、有批评的做法。编辑部自己犯的错误也坚决在报纸上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王昆仑同志检查卫生，查到报社一处宿舍，见卫生很不好，当场批评。我们想到我们常在报上批评别的单位卫生不好，现在自己受了批评，应当坚决接受，就在报纸的二版头条登出消息进行自我批评。

刘仁同志很注意报道中的具体政策问题，告诉我们不要宣传带病工作，有病应当休息；不要宣传加班加点，要劳逸结合。有一次，我们登了一个88岁的老人照顾人，刘仁同志批评我们说，不应当宣传老人生产，不应当宣传88岁的老人照顾人，你们想一

想自己 88 岁的时候怎么办？

市委领导带领我们联系实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1958 年大跃进中，市委领导全市人民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艰苦奋斗。但是，在 1958 年春天，市委领导上头脑也有些发热，开了天坛大会，宣传过高指标等错误的东西。彭真同志、刘仁同志做了自我批评，及时纠正了错误，要求一块一块地根据具体情况落实产量。彭真同志、刘仁同志重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带领我们去许多单位了解实际情况，帮助我们脑子清醒一点，在一些问题上避免错误的扩大。当时，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空气下，说是麦子一亩地能打一万多斤。我们就问刘仁同志：“一亩地麦子到底能打多少？”刘仁同志说：“你看一看究竟能打多少。”就带我们看了许多地方的麦子。到一渡河，我们看到那里的麦子绿绿汪汪的很匀称，觉得已经长得不错了，一问说可能打 400 斤左右。到小麦收割时，刘仁同志又带我们到和平公社看一块试验田，麦子长得很好很密，因为太密，联合收割机收割有困难。后来知道这块麦田打了一千零几十斤。1958 年秋，刘仁同志又叫我们种试验田，看各种不同试验田，就逐渐懂得了麦子的产量。但是 1958 年我们仍做了一些虚夸的报道，这个错误是我应当负责的。那时刘仁同志的话我没有完全听进去，怕北京落后了，也要“放卫星”，觉得“反正稿子都已经过负责人同意了”，“产量称过”。我还对全国各地“放卫星”的报道不敢不登，怕犯“右倾”，觉得“新华社发的通稿，别的报纸都登了，《北京日报》不登不好办”，“不要放得太大，登中不溜的地位也可以”，就这样，错误地上了报。这就说明有了个人主义和本位思想，就做不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就免不了犯错误。我们还错误地登了通县“老太太磨滚珠，实现滚珠轴承化”的报道。刘仁同志批评我们说：

“这样的滚珠能用吗？你登这个干什么？”我们还辩解说，群众的热情高，要鼓励。刘仁同志又说：“热情要正确地引导，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也有一些问题听了彭真、刘仁同志的话，我们实地去观察，发现了有些说法是不真实的。1958年，一位负责同志说，昌平县十三陵水库附近有一家工厂是“白手起家”，不费投资就生产了，可以报道。我们就到那个工厂去问，盖房子的砖是哪里来的？原来是私拿别的单位的砖盖的。我们把情况反映给刘仁同志。刘仁同志说“白手起家”就是“黑手起家”，这话给我们印象很深。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可能一想就有，这是唯物主义的起码知识，决不能忘记。1961年左右，另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们说，郊区办了一个“万猪场”，猪训练得一听口哨就出圈来吃食，喂料自动化，节省人力，叫我们报道。我们去一看，都感到这个万猪场是不行的。原来他们一吹哨，把圈门打开，几百头猪都跑到一个很长的槽中吃食，猪多很拥挤，壮猪压小猪、弱猪，小猪、弱猪抢着吃也吃不到，嗷嗷叫。这样猪不可能喂得好，长期下去是不行的。至于节省人力是假的，他们把辅助劳力都没有算进去。我们就没有报道，而把情况反映给市委领导了。这个“万猪场”后来也没有维持下去。我们就认识到，形式主义的东西是不行的。

彭真、刘仁同志重视记者对实际情况的反映，及时解决。1958年，本市郊区一些地方刮起了收回农民自留地的风，报社在丰台区某大队蹲点的记者对我们说，现在自留地不能收回，因为有家副业，自留地就有必要，有小自由对社员生活好处多。我们就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在常委会上展开了争论。一位负责同志坚决反对不收回自留地的意见，说反对收回自留地是右倾。刘仁同志没有因此就认为我们“右倾”，而是把这问题向上反映了，后来，中央决定不收回自留地。1956年，有个记者反映，海淀区某农业生